

《韩擒虎话本》中韩擒虎结局的叙事重构

吴苑陶

云南大学文学院，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2026年6月15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30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7日

摘 要

《韩擒虎话本》是敦煌藏经洞出土话本中保存较为完整、艺术价值较高的一篇。通过与同样记载隋将韩擒虎事迹的传世文献相比勘可知，该作品为经叙事重构而成的话本写本，其中主人公韩擒虎的结局尤具代表性。这一叙事重构中，身份叙事、仪式叙事和对话叙事三重叙事策略共同完成了英雄形象的文学建构，既展现出话本文学的大众化特质，又折射出时下大众想象对话本文学的渗透。研究这一叙事重构，可观敦煌话本文学的叙事艺术以及文化特质。

关键词

《韩擒虎话本》，叙事重构，话本文学，大众性，大众想象

The Reconstruction of Underworld Narration on Han Qinhu's Death in the *Han Qinhu Huaben*

Yuantaow W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June 15, 2026; accepted: July 30, 2026; published: August 7, 2026

Abstract

Han Qinhu Huaben, unearthed from the Dunhuang Library Cave, is a well-preserved literary huaben of remarkable artistic value. A comparative reading of this text and handed-down historical records documenting the life of General Han Qinhu of the Sui Dynasty reveals that the huaben manuscript is the product of a thorough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Collation with extant transmitted texts that likewise record the deeds of Sui general Han Qinhu reveals that this work is a huaben manuscript shaped by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in which the ending of the protagonist Han Qinhu is particularly

representative. Within this reconstruction, three narrative strategies—identity narrative, ritual narrative, and dialogic narrative—jointly accomplish the literary construction of the heroic figure. This artistic design not only embodies the popular orientation of huaben literature but also reflects the infiltration of contemporary imagination into this genre. An exploration of such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helps grasp the unique narrative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Dunhuang huaben literature.

Keywords

Han Qinhua Huaben,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Huaben Literature, Popularity, Popular Imagin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现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院、编号 S2144 [1] 的《韩擒虎话本》作为敦煌文献所存话本文学中较为完整的一篇，讲述了隋初将领韩擒虎的故事，其生动的人物塑造和曲折的情节安排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将敦煌文献《韩擒虎话本》和同记韩擒虎之事的《隋书》《欧阳修集》等史传文献进行对比，可见《韩擒虎话本》在史书基础上发生了较大改动，赋予了韩擒虎故事鲜明的话本文学叙事张力。其中，韩擒虎最终结局的叙事重构是作品典型的文学改动之一，深入分析这一情节重构的原因，有助于认识话本文学的叙事策略及通俗特质。

回顾学界现有关于 S2144《韩擒虎话本》的研究，相关成果多从外部文献、宏观小说史定位、整体赏析三大角度切入。其一为写本与创作年代考证：韩建瓴辨析写本题名、创作时段，指出该文本成书于 983 至 1009 年间，这一结论亦得到王宗祥[2]等学者认同，为判定作品时间提供参考；郑广薰则聚焦写卷形态，梳理其书写流传方式，补充了对文本外部的研究[3]。其二为宏观文体把握：王昊将该作纳入古代小说发展脉络，提出其乃后世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的雏形[4]；王志鹏[5]、高国藩[6]、周维平与李宏[7]等学者，亦均立足于整体小说史视角评判其文学史价值。其三为形象与文本的整体赏析，现有少量人物研究仅大致梳理韩擒虎整体形象，缺乏针对核心情节的细读阐释。何剑平虽依托作品中五道将军形象，考证中古敦煌文化观念风貌[8]，但仅将叙事内容视作大众观念的佐证材料，并未就传奇式书写作为叙事手法服务英雄形象建构这一现象进行深入分析。总体来看，现有研究或侧重外部文献考据，或止步于宏观文学史定位，即使涉及人物分析，也未选取韩擒虎的人物结局情节进行专门论述，更未从叙事策略层面剖析通过传奇叙事塑造形象的方法，相关的微观文本分析仍存在研究空白。

基于此，本文以韩擒虎最终结局的叙事重构为切入点，通过比对敦煌话本文学《韩擒虎话本》与《隋书》等史传文本，依托叙事学理论展开分析，阐释传奇书写塑造英雄的叙事功能。这一情节细读，既能完成对《韩擒虎话本》文本技法的深入分析，为敦煌话本文学的叙事艺术研究提供典型个案，又能在叙事重构相关外部文化原因的阐释中凸显话本文学的文化特质。

2. 相关文献与《韩擒虎话本》韩擒虎之死的文本分野

敦煌本《韩擒虎话本》正文讲述韩擒虎的英雄故事，最终以韩擒虎生命消亡后接受新任命、被赋予新身份的传奇经历作结。伏俊琰论及敦煌的小说时，曾将《韩擒虎话本》与《隋书·韩擒传》的内容进行简要的爬梳对比，意在指出《韩擒虎话本》的文本内容基本来源于史部文献[9]。基于文本的承续性，将

话本与相关史部文献中有关韩擒虎的记载进行对比梳理，是研究《韩擒虎话本》之叙事重构的一个重要基础。

2.1. 传世文献对韩擒虎结局的相关记载

成书于唐代、由魏徵所撰的《隋书》有《韩擒传》一文。《隋书》对于韩擒虎结局的书写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这一文本本身就具有开放性。自其文本细节观之，《隋书》的记载为韩擒虎接受新任命一事留下了传奇叙事展开的空间，但并不直接呈现，邻家阿母所见之人、重病者府前呓语及韩擒虎自矜之言[10]三处朦胧书写可看作叙事学范畴中的外聚焦，仅对这几则相关的社会轶闻进行客观记录，没有过度铺排相关的传奇叙事以突出韩擒虎之英雄形象；同时，也使叙述者的视野被严格限定在常人的认知范围之内，既保持了史传的客观性，也留下了叙述上的空白，这些空白是《韩擒虎话本》得以从零聚焦视角展开传奇叙事的前文本空间。《隋书》中另一段关于其死亡的记载，见于《高祖下》一篇，则是省去了那些含有幻想因素的书写，仅记有“己未，上柱国、新义郡公韩擒虎卒”[11]一句，简洁凝练，更符合史家公认的笔法范式。史部文献对于韩擒虎最终结局的相关记载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克制，并没有过多沾染上传奇的色彩，保持着具有史家特色的理性精神。

对于韩擒虎之死的史家书写，北宋的欧阳修已经旗帜鲜明地提出过质疑，见于《欧阳文忠公文集一百三十八·集古录跋尾卷第五·隋韩擒虎碑》：“而转载阎罗王事甚怪，而碑无之，使其实有，碑不宜不书，以此见史家之妄也。”[12]可见在欧阳修看来，此事是虚妄之谈，不符合历史事实，这样的说法仅是后人以灵异附会的结果。但从这一则材料也可看出，韩擒虎离世后被赋予新身份、新职责一事，的确在民间广为流传，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因此以不确切的面容进入了向来秉持真实原则的史书书写当中。此外，从两宋之交曾慥编撰的《类说》的相关记载也可见此传说在民间的流传程度：“唐严安之为京兆尹，以强明称，民吏畏之。……迎公为阎罗王，替韩王。”[13]由“替韩王”的逸笔可知，韩擒虎作“阎罗王”一事已经成为了民众的心理认知共识，具有不可小觑的文化影响。

简而言之，敦煌通俗小说作品《韩擒虎话本》产生及流传之前，相关文献虽不乏幻想式的伏笔与暗示，但笔法在整体上保持了克制和含蓄，并未充分展开传奇化的人物册封相关的叙事。但同时也要注意，韩擒虎身死后接受新任命这一传说在当时的民间，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流传度和影响力了，这一流传甚广的故事进入文学文本，既体现在正史的克制书写中，也体现在敦煌本《韩擒虎话本》对这一情节丰富的叙事重构中。

2.2. 《韩擒虎话本》对韩擒虎结局的叙事重构

相较于传世文献中对这一具有幻想色彩的事件克制的外视角叙事，在敦煌本《韩擒虎话本》之中，韩擒虎这一人物的结局情节依托前文本基础，采用全知全能的零视角进行叙事，作品中的叙述者不受时空条件限制，以身份叙事、仪式叙事和对话叙事对韩擒虎接受新身份一事进行了全面描述，可将其视为以传奇书写作为塑造英雄形象的叙事策略。

首先是相关人物身份的叙事重构：在《隋书》中，邻家阿母看到一位来迎接韩擒虎却又忽然消失的神秘人，而在话本中，这一形象被明确为五道将军。关于五道将军的职能，贾二强考证其为阎罗王的属下[14]，张国静认为其在中古时期掌管着人间祸福[15]，何剑平则补充指出，当时还流行五道将军能为人治病的说法[8]。可见五道将军在话本文学中承担着连接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的叙事功能，是在传奇叙事体系中居于虚构人物阎罗王之下、具备使者职能的经典形象。谭君强在《叙事学 叙事理论导论》中提过：“与他人的关系也帮助建构人物形象”[16]。五道将军与韩擒虎的关系正是帮助韩擒虎建构英雄形象的第一步。《韩擒虎话本》在前文本的身份空白之上，引入风靡于该时期敦煌地区的五道将军进行身份叙事，

从而在烘托中赋予韩擒虎更高的身份地位，使之与常人拉开差距，服务于塑造英雄形象的叙事目的。

其次是将任命韩擒虎这一过程整合为仪式叙事，基本遵循了“奉天符－裂地涌出－高声唱喏－隐身而去”的仪式规范：五道将军裂地而出的登场方式、穿金甲戴凤翅的服饰、高声唱喏的动作等细节描写以及“夜来三更奉天符牒下，将军合作阴司之主”^[17]的程式话语构成规范神圣的册封任命仪式，指出了韩擒虎将获得新身份的事实，将传世文献中模糊的身亡后担任新职务一事清晰化。通过这一仪式，韩擒虎结局原有的叙事内涵随之发生重构，由普通的生命消亡转化为新职务的册封，也使其获得了新的身份，具备神圣意义。仪式是韩擒虎合法抽离原有身份的程式方法，也是建构英雄崇高形象的重要叙事手段。

此外，《韩擒虎话本》还增添了一定的对话叙事，加入了韩擒虎和册封之事相关人士的诸多互动交流。这一对话叙事则暗含权力话语意识，符合大众想象及朴素价值观，是抬高韩擒虎英雄身份的最后一环。在重构的对话中，具备传奇能力的人物五道将军面对韩擒虎展现出“按三寸头低”^[17]的姿态，开门见山说明自己奉天命而来，语态温和克制，体现出下级奉命行事的谦卑；而韩擒虎则是不卑不亢，甚至厉声斥责，无视本有的界限，唬得其在韩擒虎面前显出汗流浹背的神态，在衬托中有力地凸显出韩擒虎的威严。话本临近尾声，又有二人身着紫衣和绯衣，乘黑云而来，亦作唱喏之态，对韩擒虎亦是毕恭毕敬。这处细节中，二人的着装参考古代官服颜色，可窥见以人间官僚体制想象搭建虚构世界制度的痕迹，强化了现实和幻想两界的权力联系。总体来看，《韩擒虎话本》新增的大量对话区别于传统叙事中的权力层级，凡人英雄亦可取得与传奇叙事之虚构世界中的固有权威分庭抗礼的地位。这既是一种塑造韩擒虎形象的叙事技法，同时也体现时人认可英雄、注重现世功绩的朴素价值观，寄寓大众弱化权威的平等诉求，是一种贴合大众审美价值与精神诉求的叙事表达。

至此，通过人物身份叙事的烘托、册封新身份的仪式叙事内涵重构以及对话叙事的权力秩序体现，韩擒虎最终结局的相关情节在《韩擒虎话本》中逐层完成叙事重构，在三重叙事策略的推进下成功完成了英雄形象的搭建。

3. 话本文学视域下韩擒虎结局叙事重构的原因

通过上文对传世文献和《韩擒虎话本》的比较分析，可知后者在前文本空间中运用了多重叙事策略，完成了对韩擒虎结局的叙事重构。分析叙事重构的深层原因，本文从外部文化角度入手，将《韩擒虎话本》置于话本文学的视域中，进而从话本文学通俗化需求和时下大众想象对话本文学的渗透两大角度，把握韩擒虎最终的结局情节发生叙事重构的原因。

3.1. 话本文学大众化特性

《韩擒虎话本》属于敦煌通俗话本，具备话本文学的种种特质，其中，“大众的”这一点是这一类文学作品的立身之本。敦煌话本文学的生成亦具有浓厚的大众文学色彩，它既是顺应民众娱乐需求、塑造大众文化英雄的结果，其说话技艺及底本的传播也深深根植于大众土壤。因此，在研究话本文学时，将民众的实际需求纳入考量，是极为重要的切入点。上文所分析的通过重构人物结局情节来完成形象搭建的叙事策略，正是创作者贴合大众心理、优化韩擒虎形象塑造的叙事选择。

生命消逝是所有人都要面临的终极挑战，以塑造人物为中心的话本作品中的英雄的最终结局往往需要波澜，以完善其形象。因此，话本这一直接面向广大人民、扎根民间土壤方具有流传度和生命力的作品，兼备传述人物事迹、在广大听众心中树立英雄榜样的功能。因此，在叙述韩擒虎生命消逝的结局时，则要抓住这一人生终极大事，基于现实认知而开展丰富的想象，使得话本的情节生出曲折，丰富叙事层次及内涵：话本中的韩擒虎面对生命消逝，通过身份叙事、仪式叙事和对话叙事的策略安排，完成的是超越人生有限性的升华。可以说，这一叙事重构不仅使韩擒虎的英雄形象更加伟岸高大，也延续了

话本对其一贯的倾力塑造,发挥了重要的叙事功能。

加之史书中已有关于其新身份的模糊记载,前文本为话本的改写提供了充足的阐释空间。在这一广阔的阐释空间内,话本对韩擒虎结局的具体敷演,主要基于对两种朴素大众心理的回应,这正是《韩擒虎话本》大众性的重要体现:一是面对超现实叙事所生发出的天然好奇心理;二是希望好人有好报,且认为拥有不平凡人生的英雄人物具备超越人生有限性的能力、可以获得圆满结局的朴素期待心理。于是,在相关文献及民间传闻的基础上,《韩擒虎话本》对韩擒虎的结局进行了传奇叙事的重构。这一重构本质上人民质朴美好人生理念的体现。作为口头文学载体的话本,在直接面向群众的情况下,自身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异,通过叙事文本的重构增加内容的传奇性,以能够更广泛传播的姿态展现在大众面前,通过贴合大众心理的叙事策略获得民众的认可喜爱,自觉地汲取流传所需要的生命力。

综上,将韩擒虎结局的叙事重构置于话本文学视域之内,以话本文学的大众性来看这一叙事重构,不仅可知韩擒虎结局在话本文学中发生充满浪漫色彩改动的原因,也可印证通过精心安排情节叙事策略以服务人物形象塑造、贴合大众需求的话本文学特质。

3.2. 时下大众对话本文学的渗透

扎根社会土壤的话本文学作品在产生和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吸收民众朴素的观念,将其转化为叙事材料。因此,在探讨《韩擒虎话本》中韩擒虎结局的情节重构原因时,除本身所具有的重要的大众性特质以外,还要充分考虑当时人们所具有的文化观念。以重构后的身份叙事之中新出现的具体人物“五道将军”为切入点,可见时下民间文化观念对话本作品的渗透,是大众想象的重要体现。

《韩擒虎话本》叙事重构的思想前提,在于古人灵魂不随肉体消逝,而是进入另一虚构世界的大众想象。在古代中国的大众想象当中,存在两大执掌秩序的经典虚构形象,即泰山府君以及阎罗王^[18]。而阎罗王更是逐渐取代传统观念中的泰山府君,成为传奇叙事当中首领人物的重要人选。这也是韩擒虎在话本中完成接受新职务册封、被赋予新身份这一叙事重构的社会观念原因之一。

对生命消逝的叙事扩充,也和时下的大众想象密不可分。《韩擒虎话本》产生及流行的北宋时期,对阎罗王这一虚构人物的认知应该已经相当流行,肉体消逝后灵魂前往传奇叙事之中的虚构世界的叙事逻辑也有大众认知基础。成书于983年的《太平御览》中的《卷六百五十六·异僧下》篇有记:“晋惠之末,……少时,有一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苏,云见祖法师在阎罗王处。”^[19]说明至迟在魏晋之时,生命消亡后“阎罗王”一事已有记载。北宋官方编修的类书收录此则故事,亦说明这一虚构人物相关的大众想象在宋初仍然得到认可,并有一定的传播基础。

此外,在韩擒虎结局的叙事重构过程中,传奇叙事之中的虚构世界相关的人物身份被冠以“五道将军”的名头,这不仅是塑造英雄形象的叙事策略选择,也是宋初以及敦煌地区相关大众想象的具象化体现。何剑平很早就注意到了“五道将军”,并以《韩擒虎话本》为材料,展开了对宋元讲唱文学中的大众想象的论述,为探讨话本中韩擒虎结局的叙事重构提供了参考。他列举大量中古史料详实有力地说明“逮至北宋,五道将军的尊崇已见极盛”^[8]。此外,他还注意到了另外两个敦煌写本作品中五道将军/五道大神的身影,并总结为“以上材料说明在五代至北宋初年,远离文化中心的敦煌,五道将军仍然是民间信仰中众人皆知的神明。话本作者在韩擒虎被赋予新身份职责的传说中增益了五道将军的情节,这从一侧反映了当时五道大神(五道将军)在民间的流传趋势。”^[8]五道将军这一身份具体化的新增人物,正是时下敦煌地区广为流行的大众想象渗透进入文学作品的体现,话本叙事重构与时下的传奇想象观念密切相关。

合而论之,韩擒虎结局在敦煌话本中发生的叙事重构,既是对话本文学所具有的大众性特质的凸显,对民众普遍心理的贴切回应;也是时下流行的大众想象渗透进入话本文学作品的体现。自古流传的灵魂

观念，为韩擒虎死后步入传奇叙事中的虚构世界提供了可能性；而宋初敦煌地区流行的大众想象，则为其确立了具体的权威身份。同时，五道将军的相关信仰也为叙事重构中的表演性与程式化仪式提供了文化素材。扎根民间土壤的《韩擒虎话本》通过这种叙事重构，充分体现了话本文学吸收社会文化资源以塑造英雄叙事的典型创作特质。

4. 结语

本文以敦煌话本文学作品《韩擒虎话本》中韩擒虎结局的叙事重构为研究切入点，借助叙事学理论工具，对比传世文献与话本内容在叙事视角和叙事安排上的差异，进而探究话本如何通过结局重构来塑造英雄形象的叙事策略。与《隋书》中克制客观的外视角笔法相比，《韩擒虎话本》基于零视角展开，对韩擒虎生命消逝的情节进行传奇式的叙事重构：首先通过对新增人物五道将军的具体身份叙事完成对韩擒虎的身份烘托和地位抬高；其次是借助仪式叙事赋予韩擒虎超越有限生命、获得新身份的合法性，使其与常人区分开来，完成英雄塑造的核心叙事表达；最后则是通过丰富的对话叙事，在上下级模式的对话中体现韩擒虎与传奇叙事之中虚构世界的人物之间的权力关系，贴近大众现实经验想象以及看重现实功绩的朴素价值观念。三重叙事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传奇叙事策略，实现话本中心人物的英雄式塑造，可将此视为把握敦煌话本叙事艺术的典型案例。

而传奇叙事重构叙事策略的运用，则有其外部文化原因。《韩擒虎话本》作为面向大众的话本文学作品，通过贴合大众对传奇叙事的好奇心理及英雄结局圆满的朴素期待，获得传播的生命力，展现话本文学的大众性特质。同时，以传奇叙事重构的《韩擒虎话本》也可视为时下敦煌地区所流行的大众想象渗透进入文学的有力证明，体现出话本文学充分吸收社会文化资源以实现叙事目的的创作特质。

将视野投向敦煌话本文学的开阔天地，可见《韩擒虎话本》中主要人物的结局叙事重构这一微观文学现象具有典型文学意义。一方面，它直观体现出话本文学在前文本叙事基础上有效运用叙事策略以塑造英雄人物的典型叙事路径，为研究敦煌话本文学的叙事生成艺术提供了经典案例；另一方面，这一作品作为正史传记转化为口头叙事的范本，有效展现大众心理以及社会文化观念塑造其叙事重构的过程，是理解唐五代敦煌地区话本文学文化特质的一扇窗口。

参考文献

- [1] 韩建瓴. 敦煌写本《韩擒虎画本》初探(一)——“画本”“足本”、创作与抄卷时间考辨[J]. 敦煌学辑刊, 1986(1): 51-63.
- [2] 王宗祥. 敦煌变文断代研究札记二则[J]. 敦煌研究, 2001(1): 161-163+192.
- [3] 郑广薰. 敦煌本《韩擒虎话本》的写卷制作方式和文学特点[J]. 艺术百家, 2009, 25(2): 25-32.
- [4] 王昊. 《韩擒虎话本》——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的先声[J]. 明清小说研究, 2003(4): 25-33.
- [5] 王志鹏. 敦煌《韩擒虎话本》的小说史意义论略[J]. 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 2021(00): 35-44.
- [6] 高国藩. 敦煌民间话本初探[J]. 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6(4): 57-62+117.
- [7] 周维平, 李宏. 敦煌文献中的三部唐代话本小说[J]. 丝绸之路, 1999(S1): 80-82.
- [8] 何剑平. 宋元讲唱文学中的民间信仰——以《韩擒虎话本》为考察中心[J]. 中国俗文化研究, 2023(2): 113-134.
- [9] 伏俊琰. 敦煌文学总论[M].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0.
- [10] [唐]魏徵, 等, 撰. 隋书: 卷五二 列传第十七·韩擒虎[M]. 中华书局编辑部,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11] [唐]魏徵, 撰. 隋书: 高祖下[M]. 百衲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5: 8.
- [12] [宋]欧阳修, 撰. 欧阳修集编年笺注: 卷一三九 集古录跋尾卷五 隋韩擒虎碑[M]. 李之亮, 笺注. 成都: 巴蜀书社, 2007: 428.
- [13] [宋]曾慥, 编, 赵龙, 整理. 类说选十八种: 绅胜说·阎罗王[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9: 234.

-
- [14] 贾二强. 说“五道将军”[J]. 中国典籍与文化, 1994(1): 66-69.
- [15] 张国静. 关于“五道将军”研究的几个问题[J]. 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 2007(4): 34-36.
- [16] 谭君强. 叙事学: 叙事理论导论[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119.
- [17] 王重民, 王庆菽, 向达, 等. 敦煌变文集: 上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206.
- [18] 刘影. 泰山府君与阎罗王更替考[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3): 36-41.
- [19] [宋]李昉等奉敕, 撰. 太平御览: 卷六百五十六 释部四·异僧下[M]. 四部丛刊三编本(上海涵芬楼影印中华学艺社借照日本帝室图书寮藏宋刊本): 2.